

去香港时,我爱站在维多利亚港湾边上,呆呆地看景。从港岛往北看,美!从九龙尖沙咀往南看,也是一个美!这个美不纯是自然美,也不纯是

东方美或西方美,这个美透着酸甜,透着苦辣,透着商业之光和市民之声,摩登之气和美食之香,华贵之形和自由之态,因而生出一种特殊的魅力。难怪政府急着把它收回来;难怪企业愿意跟它做买卖;难怪歌手喜欢在台上走来走去,闭着眼喘着气,学唱它的曲子;也难怪坏蛋拉人下水时总爱说,事成之后送你个香港。

其实好人没病没灾的,欲望也花,二度创作,弄出面的、摩的、哥、的姐之类,虽距 TAXI 更其遥远,却也给汉语添了新血,给思维扩了空间。一个“的”字,突然有了恁多新贡献,饮水思源,这第一功当然要记在老港头上。

老港无拘无束,敢想敢干,遇水搭桥,见招拆招,什么顺手用什么,怎么顺口怎么叫——手机叫大哥大,解雇人叫炒鱿鱼,红得发紫的演员叫天王巨星,最佳射门叫世界波,大马哈鱼叫三文鱼(SALMON),美叫靓或帅,啊叫哇或哇塞,好莱坞叫荷里活,泰坦尼饭饱,于街头扬起手,打一个的。

2007 年伊始,省作协做一年一度的新会员审批。和往年一样,平静而又平和,然而其认真乃至严肃的气氛,却总是令我有一缕隐隐的感动,两位年过七旬的副主席王愚和韦昕,对近 200 名申请者的资料表格一一翻阅浏览,还不时做着笔记,还要查看申请者提供的发表或出版的作品文本,这个工作量不可谓不大。我比他俩小过近 10 岁,常看得眼睛发粘发花,看见他俩一丝不苟如同审视经国大业的专注和认真,感动之情里又隐含着敬重。

一个令人惊喜又诧异的话题在圆桌会议上爆开,在今年近 200 名申请入会的人当中,有一个年仅 11 岁的小学生,好奇和惊诧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包括我在内的一帮年过六七十岁的审批者,面对一个尚未成年的小孩子充满稚气乃至调皮的笑脸(照片),面对一本本印刷精美的诗歌、散文、童话文本,没有谁不发出惊诧的赞叹,然而却无异议,一致同意接收这位少年成为陕西作家协会会员。她叫高璨。

这是陕西作家协会破天荒的事。大约十年以来,每年都接收发展新会员一百余人,尚未有一个未成年人会员;在 2126 名陕西作协会员的长长的名单里,如今有了一位年仅 11 岁的会员,对于那些高过九旬以及各个年龄段上的男女作家来说,当会是怎样无声无形的欣悦和激励,还有对奋进的催化。

这次召开的审批新会员的主席团会上,我第一次听到高璨的名字,第一次翻阅她已经

向往香港

刘 齐

哇,这“的”也是从香港过来的。“的”——的士,即英文 TAXI 的粤语音译,率性而作,半通不通,惹千百学者皱眉:如此胡乱用“的”,凭什么呢?

按普通话音译, TAXI 似应叫泰克塞,可你塞一个试试,没谁会让你塞。

经济或政治发达了,语言也跟着沾光,深奥点儿说,这反映了社会与文化的强势互动现象。譬如五十年前,解放军刚进城时,大家爱说首长、小鬼、乱弹琴,如今管出租车则时兴叫的。通也得通,不通也得通。这还不够,还要锦上添花。

花,二度创作,弄出面的、摩的、哥、的姐之类,虽距 TAXI 更其遥远,却也给汉语添了新血,给思维扩了空间。一个“的”字,突然有了恁多新贡献,饮水思源,这第一功当然要记在老港头上。

老港无拘无束,敢想敢干,遇水搭桥,见招拆招,什么顺手用什么,怎么顺口怎么叫——手机叫大哥大,解雇人叫炒鱿鱼,红得发紫的演员叫天王巨星,最佳射门叫世界波,大马哈鱼叫三文鱼(SALMON),美叫靓或帅,啊叫哇或哇塞,好莱坞叫荷里活,泰坦尼饭饱,于街头扬起手,打一个的。克叫铁达尼,滑铁卢叫窝打老,樱

何完成了从作文语言到文学创造语言的升华?文学创作区别于作文训练的重要标志,是想象,是丰富的绝妙的独自生发的想象能力,高璨正是在这一点上显示出超常的智慧,无论童话,无论诗歌,都张扬着

寄望灿烂

——笔记高璨

陈忠实

作家刘绍棠是上世纪 50 年代誉满文坛的神童,他的小说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作教材,其时他自己也还坐在中学课堂上当学生。国外也不乏这样的神童。人们对少年时代就成器成才的天才表现的本能的惊诧和欣喜,多是在于他或她在这样小的年龄档上所显露的才情和诗性。我在随后阅读高璨的作品时,最突出最直接的感觉就是这样。这些作品是她 8 到 11 岁时写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当是背记词汇运用词汇辨识名词动词形容词写通写顺句子的基本训练,她却已经开始进行创造意义上的写作,已不属通常的作文课上的作文。单就语言文字而言,我真的很难用普通的普通的事象去解释,这个孩子如

徐家汇藏书楼入藏的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早期英译本,均系名人译作,颇具特色。比如,幼年随父母来华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 1933 年的《水浒传》英译本(四海之内皆兄弟);由胡适作序、英国汉学家魏理 1943 年的英译本《西游记》;1880 年来华,曾任福州船政学堂教授的英国汉学家邓罗 1925 年的英译本《三国演义》等,在汉籍外译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以其勇于开拓、译笔流畅而闻名遐迩,享誉海内外。

藏书楼有关《红楼梦》的早期英文评论及译本更应受人瞩目。《红楼梦》最早引起西人关注的是 1831 年来华的德籍传教士郭实腊。他在 1842 年广州出版的

桃叫车厘子(CHERRY),草莓叫士多啤梨(STRAW BERRY),豪华公寓叫高尚住宅(简陋房屋却不叫卑鄙建筑)……

这些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的词汇,如有幸叫遍全国,响遍行云,香港会美滋滋地做一个“丛中笑”,但不会去争专利。叫不响的,遭抨击、挨埋怨的,香港也不沮丧,不赖账,甚至顾不得辩解。香港太忙,要干的事太多,香港大步流星,继续急匆匆地往前走。

一个城市,能不断影响民族,影响世界,不断让人们向往,这个城市不得了。

难怪歌手喜欢闭着眼喘着气,学唱它的曲子



刘 齐 插图

丁衣服的男孩摘下云朵,再织成布送给父母,读来令人心颤。这看似童趣依依的文字里,有如此雅致高尚的韵味,就决定了小小高璨的出色。

我看到评论家谢冕,儿童文学大家金波、王宜振,诗人沈奇和作家梁小斌,对高璨作品的评说,很是感动。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对高璨的创作和高璨现象,做出了客观新颖的评论,很富于教益。尤其是对这位少年作家的出现所表示的由衷的欣悦和关爱之情,是出于一种共有的博大而真诚的爱,显然是为着自己终身所从事也神圣着的文学,有一个可期待发展为茁壮的参天大树的苗子了。

这个高璨,确是一个让人满可期待的壮苗。我在多年对文学天才的探究中,归为一根对文字敏感的神经。这根对文字尤为敏感的神经是先天生就的,跟人群中那些生来就对数字、机械、乐律、色彩等敏感的人一样,很可能在后天的发展中成为数学家工程师音乐家画家,对文字敏感的人很自然地表现出写作的兴趣性倾向,社会就给她冠上某某天才。具有对文字敏感的少

1983 年 8 月 14 日,李光耀在一年一度的国庆群众大会上发表了令人意外的讲话,他十分严肃地指出,新加坡的男性大学生如果要让他们下一代像他们一样聪明有为,就不应该愚昧地去选择那些文化程度不高,智商较低的女性为妻。此言一出,风起云涌,人民行动党在次年选举中的得票率骤然下降 12%。

李光耀发表这番言论的起因,是一份新加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报告显示,新加坡最聪明的女性没有结婚,因为与她们学历相等的男性不肯迎娶她们。新加坡的大学毕业生一半左右是女性,其中将近三分之二小姑独处。无论是华族、印度族或马来族,男人都想要个文化程度低于他们的妻子,以保持那种居高临下的男子优越心理。1983 年,只有 38% 的女性大学毕业生嫁给学历相同的男性。

放任这种失去平衡的婚姻现象,李光耀觉得后果不堪设想。他引述了美国明尼苏达州对许多对双胞胎所做的一项研究成果:这些孪生兄弟姐妹在许多方面都非常相似,即使分别由不同家庭在不同的国家带大,他们在词汇、智商、习惯、性格、好恶等个人特征方面,仍有 80% 左右完全相似。换句话说,一个人的性格、习惯的形成,80% 来自先天的遗传,20% 才取决于后天的培育。孩子的能力多数介于双亲之间,少数会超越或不及他们的父母。因此,大学毕业的男性迎娶文化水平较低的女性,等于没有充分创造让孩子能够上大学的条件。李光耀为此疾呼他们要迎娶高等学历的女性为妻,也鼓励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生育两个或更多子女。

李光耀的观点既让大学毕业的女性不舒服,更让非大学毕业的女性不满意。一位具有高等学历的女性写道:“我是一个未婚的成功专业女性,现年 40 岁。我保持单身,因为这是我的选择。有人竟然认为区区一点钱财奖励就能让我跟男人上床,然后为了新加坡的光辉未来再生育一个天才儿童,这实在是对我的莫大侮辱。”非大学毕业的女性,加上她们的父母,责怪李光耀劝阻男性大学生跟她们成婚,抨击他是精英主义者。

面对排山倒海般的舆论批评,李光耀毫不退却。他把过去几年以 12、16 和 19 岁三个年龄层在考试成绩最好的 10% 的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对学生家长的受教育背景进行分析的统计报告公诸于世。这些数字表明:父母亲是否受过高等

年高璨,已经做出令人惊诧的创造,然而毕竟才刚刚开始,要把天赋之才——上帝(父母)给予的这根敏感文字的神经发挥到最好,成就一番文学事业,还需得做种种装备,除了知识构建,还有心理素质的构建,更有待成年后进入社会的从生活到生命逐渐深化的体验。这是优秀作家无可或缺的过程。也许这话我说得早了点儿。

《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报》1886 年第 20 卷上,以 23 页篇幅,铺叙和论述《红楼梦》。

《红楼梦》西译史上具有里程碑的事件,是其整回的英译文本的出现。

1863 年来华后人进入中国海关任职的英国人包腊,译出《红楼梦》第二回,并刊发在 1872 年的英文《中国杂志》上。另有英国驻甬首任领事罗伯冉英译《红楼梦》第六回,刊印在由上海点石斋书局 1880 年印发的《华英说部撮要》一书中,作教材之用。

《红楼梦》节译本比较著名的有留美华裔学者王际真的英译

教育是决定学习成绩优秀与否的关键。西方媒体借着这场婚嫁大辩论而兴风作浪,他们讽刺李光耀既无知,又落伍。但也有个别学者站出来支持他的。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赫恩斯坦在 1989 年 5 月份的《大西洋月刊》发表的《智商与生育率下降》一文中写道:“在我们这个时代,那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不跟教育水平同等的女性成婚,却要没有受过教育的女性,或者索性不娶。但是对于这个严峻的话题,人们往往都避而不谈,只有李光耀敢于公开评论,而现代政治领袖中没有几个人有此胆量。”

自 1983 年挑起婚嫁大辩论之后,李光耀定期公开以全国会考成绩最优秀的 10% 学生为对象的调查结果,对学生家长的教育背景进行统计分析。新加坡人渐渐地接受了李光耀的论断:家长的教育水平和智能越高,子女越有可能达到同等的水平。到了 1997 年,63% 的男大学毕业生迎娶了教育程度相同的妻子,比 1982 年的 37% 提高了 26 个百分点,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大学毕业生愿意下嫁非大学毕业的男士,告别了单身。

跟随婚嫁之后的便是生育问题。1980 年新加坡人口普查的数字报告还显示,文化程度较高的女性生育少,文化程度低的女性却生育多。完成大专教育的妇女平均生育 1.6 个子女,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的妇女平均生育 1.6 个,小学文化程度的妇女平均生育 2.3 个,没有上过学的妇女平均生育 4.4 个。一般来说,为人父母者要生育 2.1 个孩子才足以维持人口替代率。新加坡教育水平低的人口正在加倍增长,教育水平高的群体却连正常替代的水平都达不到。为了扭转这一趋势,新加坡政府鼓励受过高等教育

的夫妇要生育 3 个或 3 个以上子女,做到这一点的可享受特别所得税优惠待遇,并规定他们的子女享有优先进入重点学校的权利。与此同时,鼓励文化水平低的妇女减少或保持国家规定的生育数,规定这类妇女若不到 30 岁就生 1-2 个孩子,用颁发绝育奖的办法鼓励她们做绝育手术。如果以后发现她们又生了孩子,不但要向她们索回过去给的奖金,还要另加 10% 的复利年息。

对于李光耀学历相当的婚姻观和高知多生的优生观,人们见仁见智,难有定论。但令人感佩的是,他这种不怕丢选票、直面现实问题的勇气,在当今作秀成风的世界政坛上实属凤毛麟角。与其博得一些廉价浅薄的掌声,还不如在无知叫骂中做些造福于民众长远利益的实事。

上海图书馆馆长吴建中博士最近出版的《世界经典图书馆建筑》,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散发着浓厚的经典图书馆的时代气息。

本书在他原创《国际图书馆建筑大观》的基础上,在世界 70 多个国家城市图书馆中遴选而成,最后确定 22 个国家的 47 家图书馆,是世界经典图书馆的典范。让我们欣赏和了解不断变幻着的信息时代经典图书馆的风貌。

位于法国巴黎美丽的塞纳河畔的法国国家图书馆,它是 20 世纪末欧洲文化的辉煌。楼前是一望无际的森林,被誉为是

法兰西建筑艺术的珍品。阿根廷的“国家教师图书馆”,加拿大议会图书馆,以及无论是中国的天一阁、徐家汇藏书楼,还是美国的国会图书馆、英国的威尔士国家图书馆、日本的大阪府立中之岛图书馆,虽然建筑风格不同,但都有异曲同工之妙,镌刻着历史,是城市的文化标志。

明请读一篇《汉学宝库》。

十日谈

徐家汇藏书楼拾萃

世界经典图书馆建筑

王铭庆

